

等待刺蝟

● 陳少明

如果移用柏林 (Isaiah Berlin) 「狐狸」與「刺蝟」的分析，以觀察中國大陸80年代談大題目、論大方向的學風，我們可用「滿街都是刺蝟」這句話來概括。以學術史的眼光審察，這無疑是「空疏」或「不規範」；但從思想史角度分析，其表象背後實有更深刻的歷史內涵。當柏林用「刺蝟」與「狐狸」來比喻大體系、大題目及小題目、非體系兩種思想性格時，是以托爾斯泰的「角色錯位」為例，揭示人物思想的複雜性^①。余英時教授寫《論戴震與章學誠》，也是用它來評析十八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與時代風氣異趣的不同人物的歷史命運^②。本文的興趣，則非個別人物的性格特徵，而是時代性的學風的形成。探討方法是對其作一種總體性的粗線條勾勒，即刺蝟式的。

如果我們同意十八世紀乾嘉時代是狐狸當道的說法，那麼二十世紀便是刺蝟得勢，而十九世紀則是一漫長的過渡期。今文經學的再度興起，最

能體現刺蝟意識的歷史意義，這是思想家面對深重的社會危機時的時代性反應。從鴉片戰爭前後龔自珍、魏源抨擊時弊，呼籲變法就可以看出，刺蝟意識的出現同變法的願望，即對整個價值系統的改造的要求是聯繫在一起的。到了世紀的轉折點，康有為集今文之大成而將其餘力發揮到盡頭。不論《新學偽經考》的疑舊，還是《孔子改制考》的維新，一破一立，焦點都指向整個價值體系的合法性重建。這是真正的刺蝟行徑。但不僅康有為，其追隨者包括譚嗣同以及他們圈子外的嚴復，都對本世紀學風轉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梁啟超就自稱是學時「思想界之陳涉」，而嚴復譯述《天演論》，所提倡的世界觀也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可以說，正是從戊戌開始，迎來了刺蝟角逐的時代。它於新文化運動後諸多「主義」之爭中達到高潮，而新史學的興起與演變則深刻凸現時代思潮同學風的關係。

* 本文是作者在哈佛—燕京學社召開的「中國當代人文學發展的反思」(紐約，1996年6月)學術論討會上提交的論文，有刪節。經主持人杜維明教授同意，另行發表，特此致謝。

一 「主義」領先

戊戌時期的刺蝟意識，可能少有自發的狀況，而「五四」以後，便變得十分自覺，動輒標榜「主義」的時尚就是證明。但是，即使是刺蝟得勢的時候，也有狐狸的身影、聲音存在。古文大師章太炎，有古文血統又引經驗主義為嫡親的胡適，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章太炎在經學上批駁康有為，堪稱是狐狸對刺蝟叫陣，然而他在這方面的影響僅限於專業圈子中。值得一說的，倒是比較「新潮」的胡適。他是站在狐狸的立場上挑起問題與主義之爭，自覺向刺蝟發難的人物。

儘管胡適不喜歡社會主義，但當他要求輿論界「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時，所針對的並非某種特定的主義，而是各種各樣的主義。簡言之，是討論思想方式或學風而非爭論社會政治立場，焦點是反抽象。在胡適看來，主義是抽象的，談主義不可避免會導致空談，甚至會有混淆視聽的後果。然而，胡適沒法證明「抽象」就一定是空談，更沒能讓人相信其所列舉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同任何「主義」無關。當胡適把「問題」與「主義」同具體與抽象對位聯繫起來後，就出現了兩條反駁的途徑：一是從方法論入手，一是以經驗現實為據。藍志先與李大釗分別採取不同的方式。但是，從方法論入手，還是要刺蝟與要狐狸的爭論；而對現實的分析，則可能變成要那一種刺蝟的主張。因此，藍志先的論說更扣近我們的論題。

藍志先從問題可以分具體與抽象兩種意義，進而強調複雜的問題或大問題的抽象意義更重要入手，從而把問題與主義聯繫起來。他說，有些事情，「從他根本的方面着眼，便成了

抽象性的問題，從他實行的方面着眼，便成了具體性的問題」③，例如④：

舊制度和新理想的衝突問題：這種問題，大概通常稱為革命的問題（廣義的）。起初的時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惡方面爭，即標示的改革方法，也決不是甚麼具體方法，一定是一種趨向的標準，（這種標示，與其說是方法，毋寧說是目標）。譬如法國大革命時候所標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國辛亥革命時所標示的排滿，算是具體的方法呢，還是理想的目標呢？這可以不言而喻的。故凡是革命的問題，一定從許多具體方法，抽出幾個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才能發生效力。若是臚列許多具體方法，即就變成一種條陳，連問題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進行方針呢？於此可見問題不限於具體性，而抽象性的問題更重要了。

胡適是站在狐狸的立場上挑起問題與主義之爭，自覺向刺蝟發難的人物。



在他看來，所謂「主義」就是指那些抽象而重要的問題，在加入理想的要素以後，形成多數人的行為標準或態度。所以，其結論自然與胡適相反：「吾們因為要解決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到大總統的權限；從賣淫到賣官賣國；從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國聯；從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問題；所以要研究種種主義。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最切實的第一步。」^⑤

毫無疑問，談「主義」就是刺蝟意識在當時的具體表現。明確地說，從思想方式看，它是強調對複雜的社會事象作概括性的總體把握；而其社會功能，則是追求對價值原則（所謂「趨向的標準」）作根本的轉換。一個時代的危機，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賴以維繫的主義的危機。不過，新主義意識對危機的初步反應未必很自覺，如戊戌時期，也就是籠統談西學或新學，而到了啟蒙的高潮，各種主義應運而生，群起爭奪填補意識形態的空間。

從胡適的進一步反應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狐狸的思路及困難。其一，他反對藍志先關於「主義」應包括問題的抽象面及理想面（即態度）的提法，而硬把「理想」說成「想像」。這就是無視「主義」具有表達社會政治立場的功能，實際也就排除解決社會問題需要的價值前提，難怪他一開始就把「學理」同「主義」相提並論。其二，在上述前提下，儘管他提及的許多問題，中國的如「大總統的權限」，外國的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水力，銀行，收歸國有」等，本都是離不開「主義」即社會基本立場的問題，但他都可輕易的要求大事化小：「問題的範圍愈大，

裏面的具體小問題愈多。我們研究時，決不可單靠幾個好聽的抽象名詞，就可敷衍過去；我們應該把那太大的範圍縮小下來，把那複雜的份子分析出來。使他們都成了一個一個的具體的簡單問題，如此然後可以做研究的工夫。」^⑥

胡適大概以為解決社會問題時，價值立場可以存而不論，或者解決的標準由經驗對象直接顯示出來，因此才能把刺蝟的任務交給狐狸。但這種經驗主義的想法畢竟問題太大，胡適本人又覺得不妥，所以他在〈四論問題與主義〉中專「論輸入學理的方法」，聲明「我雖不贊成現在的人空談抽象的主義，但我對於輸入學說和思潮的事業，是極贊成的」^⑦。這看似是狐狸對刺蝟的讓步，但其實是對歷史情勢的順應。胡氏是新思潮的弄兒，他寫〈新思潮的意義〉時，把研究問題、輸入學理都作為新思潮的手段，同時又把新思潮的精神歸結為「評判的精神」，即「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不就是「主義」的工作嗎？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自然是各種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主義」領先的信念，助長了刺蝟學風的蔓延。

二 新史學：刺蝟得勢之後

胡適派的整理國故無疑成就了部分狐狸的業績，但時勢需要刺蝟。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胡曾不無自信地說：「這種唯物的歷史觀，能否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實現，現在已不無問題，因為現在社會主義的根據地，已不靠這種帶着海智兒（引者註：「海智兒」即黑格爾）臭味的歷史哲學了。」^⑧但胡適錯了，後來偏偏就是黑

格爾式的刺蝟大行其道，新史學發展的趨勢就是證明。

這是一個史學與意識形態、學術史與思想史幾重公案相交織的課題。借周予同的劃分，我們把現代史學（或稱新史學）的發展看成「疑古」、「考古」與「釋古」三種傾向或遞進的三個階段^⑩。「疑古」的先驅是康有為，主力則是古史辨派，但兩者有些區別。康有為的「疑古」仍在經學框架中，顧頡剛等的「疑古」已走到經學之外，其工作是史學而非經學；另外，康的疑經指向價值體系的轉換，是刺蝟的事業，而後來的「疑古」沒有體系性的目標，是狐狸的工作。與「疑古」對立的是「考古」（包括文物與文獻），最著名為王國維。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置疑，後者執信，但都是狐狸的工作。胡適本人對疑古派很有影響，自己的「整理國故」是又疑又考，故梁啟超說他「用清儒的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

但現代史學並不於「疑」、「考」止步。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提出的目標，恰好是刺蝟式的。周予同評論說^⑪：

梁氏於批評舊史學之時提出他對於新史學的界說：「第一，敘述進化之現象」；「第二，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第三，敘述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他的全部史觀建築在進化論之上！而且不以敘述歷史的演進現象為滿足，並進而探求歷史演進的基因，浸浸乎和最近釋古派的理論相近！

郭沫若是後來「釋古」的代表，他就聲稱^⑫：

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局限的一步。

想當刺蝟的不只是郭氏一人，20、30年代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其實就是刺蝟的角逐。爭論各家不論



想當刺蝟的不只是郭沫若一人，20、30年代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其實就是刺蝟的角逐。

持有何種觀點，大多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術語，都試圖借助史的解釋來對中國社會作整體把握，以指示其未來的走向。說到底，就是企圖在舊秩序崩潰的情勢下，提供一套新的價值系統。對此，郭沫若毫不含糊：「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②他的使命就是要證明不存在例外於唯物史觀的「中國國情」。郭氏所追求的，正是胡適所警惕的。胡適說：「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只可以作一些假設(待證的)見解，不可以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③刺蝟的指向是普遍、抽象，而狐狸則擔心它傷害特殊、具體。郭氏對種種文物、文獻的研究，目的是服務於一種歷史哲學；而胡適的輸入學理，卻是為了把握大大小小的事實。對前者是目標的東西，於後者則成為工具。但郭沫若的論說所提供的不僅是知識，而且迎合了渴望革命的左翼知識份子情緒的價值信念，所以它更有傳播市場。

接下來的故事便是大家都熟知的。唯物史觀成為新意識形態的護法以後，不僅狐狸退場了，原來意識形態真空時期眾多刺蝟爭雄的景觀也消失了，出現的只有一種刺蝟獨大的局面。它在學術上造成的變化是：本來釋古的傾向是為證明新歷史哲學的合理性而出現的，現在則反過來，由歷史哲學來規定歷史學的合法性了。史觀比史實優先。在刺蝟還未得勢的時候，同樣也有刺蝟抱負的馮友蘭就批評過：「釋古一派之史學多有兩種缺

陷：第一種是：……往往對於史料，毫不審查，見有一種，與其先入之見相合者，即無條件採用。……第二種缺陷是：……往往談理論太多，……感覺他是談哲學，不是談歷史。」^④但得勢之後，情形就更不可收拾了。

三 50年代之後

50年代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主要內容是學習唯物史觀。其反覆強調的是立場、觀點，而非事實、證據。在史學方法上，則突出史與論的關係問題，即以論帶史、史論結合還是論從史出的選擇，但整個實際傾向是以論代史。不少爭得沸沸揚揚的其實可能是偽問題。不僅如此，有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哲學後，社會科學許多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甚至都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儘管史學界也有人對學風的空疏提出異議，郭沫若也承認需要在史料的佔有上追趕陳寅恪等人，然而，只有當極左的意識形態根源被清算後，學風才有可能被矯正。但是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對極左價值體系的反抗，恰好又是刺蝟的工作；80年代的思想解放——文化批判運動，也是一次「新啟蒙」。新啟蒙時代又是發宣言、高談主義的時代，也是刺蝟躍躍欲試的時代。

在80年代對思想學術影響較大的李澤厚，就學術風格問題曾有一番「見樹」與「見林」的議論^⑤：

我覺得，在某些情況下，先「見林」比先「見樹」更重要。坦率地說，對於當今一些大的理論框架，我是不大滿意的，很希望自己的書能在大的方面見

「林」，也許是比較模糊的「林」。……就思想史而言，研究至少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歷史學家的方法，一種是哲學家的方法。歷史學家的方法主要著眼於歷史事實本身的真實、準確和清晰，對任何細節都不放過；哲學家則主要是借歷史來發表個人的見解，所以往往把歷史和現實聯繫起來……。

見樹與見林，也是狐狸與刺蝟的不同取向。但當「貪大求全」的學風蔓延之後，李也覺得應該糾偏：「我一直提倡微觀的實證研究，搞大量的小題目，細微研究一下，講清楚。開始的時候有人搞一些大題目，寫些宏觀文章，提出問題，提些重要看法，是可以的。但是，一窩蜂繼續這樣搞下去，就有問題了。」^⑩不過，只有到了90年代，學術史的被重視，才能看作是對刺蝟式學風的一種反撥。只是如果離開歷史的分析、評價，孤立地就學理談學風，便有可能產生一種鐘擺式的效應，在同一平面上樹立而不是深入。

二十世紀是刺蝟得勢的時代，這是由現代中國的歷史情勢決定的。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傳統的社會結構及價值系統就日趨解體，世紀末康有為維新的努力沒有成功，結果是舊體系瓦解，新體系未成，價值出現真空。「五四」前後關於種種主義的論戰，實質都是意識形態領導權或價值空間的爭奪。50年代以後雖然一統天下，但從思想運動不斷的情形看，得勢者也似乎沒有真正的安定感。到80年代又有所謂「信仰危機」，有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以及傳統文化批判等問題。所有這些跡象都表明，在思想界以及整個知識界中，對中國

社會前途的價值前提仍沒有獲得可以持久認可的共識。直至今日，情況仍未改變。而正是一種表達社會信念甚至是擺脫價值危機的努力，使各種論說都有總體解釋的傾向，從而造成刺蝟式的學風同二十世紀相始終。

準確一點說，我們仍是處在等待刺蝟的時代。

註釋

① 參閱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Fox", in *Russian Thinkers* (London: Hogarth, 1978, reprinted, Penguin Books, 1994).

② 參閱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

③④ 藍志先：〈問題與主義〉，轉引自葛懋春、李興芝編：《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頁97。

⑤⑥⑦⑧⑨ 同上書，頁104；114；119；122-23；339。

⑩ 參見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⑪ 同上書，頁539。

⑫⑬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viii；vii。

⑭ 馮友蘭：〈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序〉，轉引自註⑩書。

⑮⑯ 李澤厚：《走我自己的路》，修訂本（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頁76；501。

陳少明 廣東汕頭人，1958年出生，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著作有《儒學的現代轉折》、《漢宋學術與現代思想》、《被解釋的傳統》（合著）及《反本質主義與知識問題》（合著）等。